

# 青海新出明《故母全氏游孺人墓志铭》 与明初河湟江西移民

孙 杰

**提 要：**2019年青海省西宁市新出明《故母全氏游孺人墓志铭》记述游孺人全氏的家世、婚嫁、妇德和家族成员概况，描绘了志主全龙贞“女中君子”的完人形象，是我们了解明代女性形象的重要墓志资料。志文记载志主死后葬于江西临川，但墓志铭却出土于青海西宁，志文记述志主的卒葬地与墓志铭出土地点空间上的错位，应与明初江西、河湟两地的移民活动有关。明初河湟江西移民人数虽不及江苏、安徽，但江西籍移民同样也是明初河湟江淮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明代 西宁 临川 河湟移民

2019年3月15日西宁市博物馆接报，称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颐贤新城小区内伐树时，在树底发现墓志铭一方，经现场仔细勘察，确认除石质墓志铭外，并无其他任何发现，墓志铭现保存于西宁市博物馆。墓志铭为石质，呈碑形，圆首，底部有凸出的榫头，榫头处有对穿圆孔，推测墓志铭原有底座，立于其上。明代，墓志铭多呈方形或长方形，这种碑形墓志铭较为少见，是典型的碑志合一的样式。<sup>①</sup>志碑长70厘米、宽43厘米、厚4厘米。碑首部分刻并列圆环，内书“日”“月”2字，下书“故母全氏游孺人墓志铭”。志文竖行20行，共496字。

## 一 墓志铭录文

### 故母全氏游孺人墓志铭

临川东馆社庠教读陈礼撰文并书

孺人讳龙贞，父全世庸，母彭氏，生孺人大明正统戊辰年五月初四日亥时。自幼聪明，善女红，闻于姆训。甫笄，归于东馆蟾田游君翰兰，事姑相夫，克全妇道，而闺门之内，是故家以之而成，内以之而美。卓乎，女中之君子。生男三，长曰成祖，娶林氏。次曰普祖，故，娶方氏。幼曰兴祖，娶陈氏、胡氏。生孙有七，积受娶夏氏。延受娶周，已故。新受娶曾氏。广受、官受、爵受、禄受、仙受，恩孙进受，皆未娶也。生延孙有十，孝宗、耀宗、显宗、荣宗、衍宗、达宗、元宗、亨宗、利宗、贞宗亦未娶也。吁，孺人以德配德，庆垂孙子，多而且贤，如此宜偕老百年，而享甘旨于心也。奈何天啬其寿，以疾终于正德己卯年十月初三，享年七十有二而已。呜呼痛哉！卒之明日举柩在外，择取本年十月初十庚午日卯时，葬于九十三都楼下山，而安厝之，首癸趾丁，兼丑未三分，从吉兆也。为以窀穸有期，厥子游成祖等抱石请记而为铭，以垂万代。予忝表侄，久闻孺人德行，于是孺人素行述之而铭矣。庶几孺人之德之贤，与山水一同亘古今而无休息焉。铭曰：

<sup>①</sup> 参见邵然：《新中国以来北京地区出土明代墓志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6页。

山秀水清 孺人佳成 迎光潜德  
 耿耿其明 万有千岁 保我后生  
 大明正德十四年岁次己卯冬十月初十之吉也  
 孤哀子游成祖兴祖重孙新受泣血立石

## 二 志文释读

该篇志文的撰写者为临川东馆社庠教读陈礼。临川，即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明代临川隶属抚州府，属抚州府下辖五县之一。东馆，应指临川县东馆市。明弘治《抚州府志》载，临川县有“东馆市”在九十九都<sup>①</sup>，清道光《临川县志》载：“九十一都为图者三，共村庄四十四处，有东馆市、节孝坊（为游咸和之妻邓氏立，在基桥，嘉庆二十年题）。”<sup>②</sup>可见直到清嘉庆年间这里仍有游姓族人居住。社庠，即社学。社庠教读，即社学教读，也称社师，陈礼其人不见史料记载。

志主全龙贞，父全世庸，皆不见史料记载，全龙贞生于明正统戊辰年，正統是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正統年间只有一个戊辰年，即公元1448年。全氏自幼聪明，善女红，刚15岁就嫁给“东馆蟾田游君翰兰”，因此志文说“甫笄归于东馆蟾田游君翰兰”，“笄”古代女子用的发簪，这里代指“笄礼”，古代女子15岁称为“及笄”，要行“笄礼”表示成年。

婚后的全氏一边尽心侍奉婆婆，一边相夫教子，十分贤德，在她的操持下游氏家族兴旺发展，子孙“多而且贤”，因此志文称赞其为“女中之君子”。据志文记载，全氏共有子3人，孙7人，重孙10人。（志文中称全氏“生孙有七”，但在后文中却列出积受、延受、新受、广受、官受、爵受、禄受、仙受、进受等孙9人，不知是否为志文撰书者的笔误。）儿孙满堂的全氏未曾享受儿孙孝敬奉养，却遗憾因病于正德己卯年去世，因此志文说“多而且贤，如此宜偕老百年，而享甘旨于心也。奈何天嗇其寿，以疾终于正德己卯年”。正德是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己卯年即公元1519年，这一年全氏72岁。

全氏死后当年葬于“九十三都楼下山”，这里的“九十三都楼下山”应是指江西临川县“九十三都楼抚山”（下文详述），“都”是明代江西地区广泛设立的地方基层组织之一，明弘治《抚州府志》和清道光《临川县志》都记载，临川共有109都<sup>③</sup>，九十三都恰在其中。“首癸趾丁，兼丑未三分，从吉兆也”是一些风水术语，首，头部；趾，脚部；癸，属北；丁属南。“首癸趾丁”也就是说全氏下葬时，头朝北，脚向南。明代父母去世后，子孙往往会请士人为逝者撰写墓志，以表孝心。因此在全氏去世后，其子孙就请陈礼为其母撰写墓志铭，而陈礼答应撰写这篇墓志铭的原因，是陈礼与全氏为表亲关系，因此志文中陈礼自称“予忝表侄，久闻孺人德行，于是孺人素行述之而铭矣”。孝妇、贤妻（节妇）、严母3种社会角色是明代社会衡量和判断一个女性最基本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明代女性墓志，志文内容都是从这三方面去追述和赞扬志主的，这篇全氏游孺人墓志铭亦不例外。

① 参见吕杰纂修，弘治《抚州府志》（上册）卷2《封域四·墟市·临川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

② 刘绳武等修，纪大奎纂：道光《临川县志》卷4《城池》，道光三年县学尊经阁藏板，第25页。

③ 参见刘绳武等修，纪大奎纂：道光《临川县志》卷4《城池》，第28页。

此外，志文开篇即以“孺人”尊称全氏，但通读志文我们并未发现全龙贞丈夫游瀚兰或其子孙中有符合这一条件者，因此全氏“孺人”封号并非实际获得，而是来自于其后人和志文撰写者的尊称，这也是符合明代志文撰写习惯的。

### 三 全氏卒葬地

志文中称志主全氏死后“葬于九十三都楼下山”，“九十三都”和“楼下山”都是地名。“都”单独作为一种乡治组织始于南宋孝宗<sup>①</sup>，元代“都”这一名目的使用范围更广，尤其是在原南宋统治地区，许多地方开始改“乡”“里”为“都”。明代江南地区传统乡里组织多仍宋元之旧，“都”的建置较为普遍<sup>②</sup>，是基层乡治组织在江南地区不断完善的表现和明中央政权不断加强对江南基层社会控制的举措之一，但“都”作为一种乡治组织，仅就目前所见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并未在明代青海地区实行过。原因是虽然专制集权在明代得到了持续发展，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大大增强，但这种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在不同地区是有所差异的，是不平衡的，采取的举措也是不一样的。

明代，西宁所处河湟地区属“边地”范畴，自汉晋宋元以来中央朝廷对于这一地区的控制无不都借助于当地土著酋豪，地方政权拥有很强的独立性。<sup>③</sup>明代亦不例外，明初为加强边防设立的西宁卫虽属军民卫所，既管军又理民，但与内地实行的府县制度是有差别的。府县系统中官员皆为“流官”，没有“世官”，而卫所系统中则除“流官”外还有世袭“世官”，多为当地土著酋豪，他们拥有自己的族众属民，编入卫所后，其旧属仍由其统领，部落组织依旧存在<sup>④</sup>，如西宁卫土官中“李、祁二巨族，众数万人，咸习弓马”<sup>⑤</sup>。这就使得明朝廷对于河湟地区基层组织的控制不得不借助这些土著酋豪，因此明初虽在河湟地区建立里甲制度（其中河州“原额四十五里”<sup>⑥</sup>，岷州十七里<sup>⑦</sup>，西宁四里<sup>⑧</sup>），但里长户、甲首户不是府县制下依制轮充的，而是由这些土著酋豪世袭相承，直至清初依然如此。<sup>⑨</sup>里甲制成为明初唯一在河湟地区建立过的乡治组织，且由于地方土著酋豪势力的存在，里甲制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如岷州军卫于嘉靖时曾一度设立州治，实行军民分治，但结果却是“民夷胥称不便，地方渐敝”，只好裁革。《西宁卫志》在言及刘敏宽任西宁道政绩时仍将“行乡约保甲之法”<sup>⑩</sup>作为其政绩之一特意记

① 参见《宋史》卷400《袁燮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146页。

② 参见余清良：《明代福建地区基层乡治组织研究——以传统乡里组织和里甲为中心》，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34页。

③ 参见何威：《博弈与重构——清朝前期河湟地区的基层社会与家族组织》，《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④ 参见杜常顺：《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⑤ 参见周一敬：《甘肃镇考见略》，崇祯刊本抄录，1957年，第80页。

⑥ 参见吴祯著：嘉靖《河州志》卷1《地理志·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⑦ 参见汪元纲修，田而穰纂：康熙《岷州志》卷2《舆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19页。

⑧ 参见杨应琚撰：乾隆《西宁府新志》卷33《艺文》，“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287页。

⑨ 参见杜常顺：《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⑩ 参见刘敏宽、龙膺纂修，王继光辑注：万历《西宁卫志》，“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述，刘敏宽曾于万历时任职西宁道，这距离明初洪武时期河湟地区实行里甲制已过百年，足见里甲制在西宁卫的设置和推行并不理想，更不论“乡”“都”“里”“图”等更为完善的乡治组织的推行。

因此，这里的“九十三都楼下山”不太可能是墓志铭出土的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通读志文唯一具有地理空间辨识度的地名只有临川，那么这里的“九十三都楼下山”是否就在临川？弘治《抚州府志》载：“积善乡为都七，在县（临川）南八十里……九十三都，四里”<sup>①</sup>，九十三都恰在其中，属积善乡。“楼抚山，在城南（临川）八十里，普润院在焉，有碑云，峰连万叠，岳耸千寻，水绕长山，冈蟠巨野”盖指此也。<sup>②</sup>《临川县志》也有相似记载：“楼抚山，在城南（临川）八十里，有普润院，唐普润禅师道场，其碑云，峰连万叠，岳耸千寻，水绕长山，冈蟠巨野。稍东南为仙人岭，下有石井，又南为潭山，诸山志水皆东注于汝。”<sup>③</sup>上述史料虽未明确说明“楼抚山”所在地是否为九十三都，但都记载九十三都和楼抚山二者所在的方位是临川城南80里处，以临川县城为坐标，楼抚山应该就在积善乡九十三都。所以志文所称“九十三都楼下山”指的应该就是临川城南80里处的“积善乡九十三都楼抚山”，全氏葬地正是在是处。墓志铭出土地点不见任何随葬品和墓室以及棺槨的痕迹，更坚定了我们这一结论的肯定。如上述推测不误，就会出现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既然志主全龙贞死后葬于江西临川积善乡九十三都楼抚山，那么她的墓志铭为何会出现在青海西宁北川河岸？这应与明初河湟地区江西籍移民有关。

明初出于加强西北边疆防御的目的，在河湟地区设立“西番诸卫”，并大规模向河湟地区移民，以充实“西番诸卫”人口进行屯戍。屯戍河湟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江淮地区，多达9万人<sup>④</sup>，一些地方如岷州“移直隶官兵守之，汉姓则多直隶”等地人，兰州则“十之八九为江南人”。《兰州古今碑刻》收录40个有志主籍贯的明代墓志，其中籍贯为江淮地区者多达23通，尤以南直隶所属江苏、安徽为最多。<sup>⑤</sup>西宁亦是如此，明初移民西宁的江淮籍人物可考者，有西宁魏寰，始祖魏善，本泗州人，从明太祖起兵，因公授世袭千户，管西宁卫中左所副千户事，因家焉。<sup>⑥</sup>莫与京，始祖得，本寿州籍，自元末归附前明，洪武中授西宁世袭指挥僉事。<sup>⑦</sup>贵德王猷，本江南宜兴籍，从明太祖起兵，永乐四年拔贵德千户守御。<sup>⑧</sup>此外还有湟中徐勇，西宁市湟中区徐家寨村民徐彦帮藏有《明太祖敕封徐勇诰命》，据载徐勇系扬州府如皋县丁溪场住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归附明军，充总旗，转战南北，洪武十八年（1385）除昭信校尉，调西

① 吕杰纂修：弘治《抚州府志》（上册）卷1《封域·建置·临川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7页。

② 参见吕杰纂修：弘治《抚州府志》（上册）卷3《山水·临川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83页。

③ 刘绳武等修，纪大奎纂：道光《临川县志》卷5《山川》，第9页。

④ 参见晏波：《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兰州学刊》2012年第12期。

⑤ 参见薛仰敬：《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00页。

⑥ 参见杨应琚撰，崔永红校注：乾隆《西宁府新志》卷27《献征·人物》，“青海地方史志文献丛书”，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83页。

⑦ 参见杨应琚撰，崔永红校注：乾隆《西宁府新志》卷27《献征·人物》，“青海地方史志文献丛书”，第485页。

⑧ 参见杨应琚撰，崔永红校注：乾隆《西宁府新志》卷28《献征·忠节》，“青海地方史志文献丛书”，第500页。

宁卫所充流官百户，遂世居湟中。<sup>①</sup>因此，以往关于明初河湟移民的关注点也多集中于江苏、安徽两地，关于江西籍移民则少有关注，但翻检史料我们发现明初河湟地区同样存在江西籍移民，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一）出任地方官员者

代表性人物如黄琥，江西丰城人，由举人成化十二年（1484）任<sup>②</sup>，字莹之，江西丰城诗礼巨族。<sup>③</sup>宣义昭，江西饶州府鄱阳县人，举人，成化丙戌年（1466）任。<sup>④</sup>

### （二）从征官兵留戍者

代表性人物如魏振，祖郁，江西德化籍，以国初军功授临洮府副千户，万历时已传7代。<sup>⑤</sup>孙效康，祖得先，江西浮梁籍，以国初军功授临洮府百户，万历时已传9代。<sup>⑥</sup>张克孝，祖信，江西丰城籍，以洪武军功授临洮府百户，万历时已传9代。<sup>⑦</sup>此外，民国《和政县志》载：

姚靖芬，号葵轩，原籍江西德兴县人，明初为转运推官，历升至奉政大夫，洪武九年武顺王邓奉命为征西将军，大营驻宁河（今和政县），靖芬转运至斯，因家焉，是为姚氏始祖，所绘影图尚存。相传占籍宁河者，惟邓氏、姚氏、党氏较早，邓为王宗文，党为王掌厨，姚为王督运，今三氏后裔俱繁衍，而姚氏尤著，耆年硕德代代而有。<sup>⑧</sup>

从上述这段记载看，今临夏州和政县姚氏原籍为江西德兴，邓氏、党氏虽未明确记载原籍是否同样为江西，但从这段记载还是可以推测二者原籍很有可能也是江西。

### （三）流寓或隐逸者

代表性人物如王武，字彦武，河州卫籍江西人，号友月，博通经史，尤长诗词，尝与解学士游，遗文最多，解文集内恒齐记是其人也。<sup>⑨</sup>是处称王武为河州卫籍江西人，可见从江西移民至河州的王武已入籍河州。

明初江西是明军重要的军需给养基地，随着明军的推进，大量江西民众随军而行，经营如粮食、布匹、木材、纸张、瓷器等各种生活品，由此形成了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浪潮，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也包括甘肃、西藏等边疆地区，他们或携货往返，或在当地娶妻落籍。<sup>⑩</sup>同一时期，明朝廷为充实西宁卫等西番诸卫，开启大规模移民戍边的序幕，其中跟随邓愈、沐英、冯胜、耿炳

① 参见崔永红：《明代青海河湟地区屯田的分布和军户的来源》，《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②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2《官师表·同知》，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193页。

③ 参见张维撰：《陇右金石录》卷6《永宁桥记》，民国30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拍印版，第656页。

④ 参见吴祯著：嘉靖《河州志》卷2《职制·儒学教授》，“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⑤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4《武胄表》，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241页。

⑥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4《武胄表》，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243页。

⑦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4《武胄表》，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246页。

⑧ 民国《和政县志》卷6《乡俊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97页。

⑨ 参见吴祯著：嘉靖《河州志》卷2《职制·国朝隐逸》，“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54页。

⑩ 参见刘生文、廖艳彬：《明代江西人口流移探析》，《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5年卷。

文等将领进入河湟地区的，江左淮泗一带军卒及其家属，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sup>①</sup>因此，上述史料中所记载的明初江西籍移民无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士人阶层，更多的则是普通民众。因此，志主全氏夫家游氏家族极有可能就是明初河湟江西籍移民中的一员。明初也有部分河湟士人出任江西地方官吏，如正统年间的兰州进士聊让曾出任南昌知县<sup>②</sup>，河州岁贡王昱更是曾在洪武年间出任临川知县。<sup>③</sup>

肯定了明初河湟地区存在江西籍移民这一事实，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志文明确记载志主葬于江西临川九十三都楼下山，而墓志铭却何以出现在青海西宁。关于这个问题因为志文没有提供任何可供考证的线索，我们也没有在墓志铭周围发现任何其他遗存，所以只能提出两种假设。第一，志主全龙贞逝于原籍江西临川，该墓志铭是移民至西宁的全氏子孙为表思亲之念所建衣冠冢墓志铭。第二，志主全氏逝于青海西宁后归葬于江西临川，该墓志制作于西宁，但在全氏归葬时并未被一同带走，这种逝于异地在异地制作墓志铭并归葬的情况历史上有例可寻，如2000年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征集的前秦梁阿广墓志，墓志阴面有双行刻字“碑表及送终之/具于凉州作致”<sup>④</sup>，表明墓志于凉州制作，而后运至归葬之地。这仅仅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想，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

最后，明初河湟地区可考游姓士人还有游坚，字文固，号三山先生，应天府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永乐间谪戍河西，因寓于兰，有文翰存于兰。<sup>⑤</sup>游太学，狄道岁贡，正统年间任大理寺副。<sup>⑥</sup>

## 结 语

明洪武六年（1373）明朝改西宁州设西宁卫，筑西宁卫城，西宁成为“西夷重地”“河西巨镇”。但因地处边地，一直以来西宁地方史料都较为贫乏，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西宁道杨应琚编修《西宁府新志》时就发出“边地质野，文献无征”的感慨和无奈。此次发现的《明故母全氏游孺人墓志铭》虽缺失一些关键信息，但通过志文考证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明初河湟江西移民的一些线索信息，对于研究明初河湟移民以及明代西宁地方历史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西宁市博物馆）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参见王昱、聪喆：《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②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5《选举表》，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253页。

③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5《选举表》，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255页。

④ 参见罗新：《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⑤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20《人物传下》，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442页。

⑥ 参见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卷15《选举表》，东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第255页。